

扎根理论:方法误用与正本清源

陈 尹

(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作为一套整体方法论,扎根理论正遭遇肢解式和退化式的传播与使用。从文献回顾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扎根理论传播和应用过程中范式林立、乱象丛生有其历史根源与现实本质。研究发现,作为原创者之一的斯特劳斯在方法内核建立过程中的缺席为其后续方法论偏离埋下了历史根源。扎根理论方法的误用,具体表现为质性研究的“深描”嫁接,假设演绎思维的方法渗入,“三级编码”和“NVivo”的技术误导。回归本源,扎根理论方法的规定性,是遵循自然呈现基本原则,基于一整套方法程序来“让资料自己说话”,从而生成抽象概念化理论。研究新手在运用扎根理论时,应当明确初心、具身学习、面向社会,才能将其中的方法内核,融会贯通于研究过程。

[关键词]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假设演绎;NVivo;具身学习

[中图分类号]C31:B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2)06-0079-15

扎根理论方法被如此多的学者说着、教着、写着,但正确使用它的人却凤毛麟角。大量“某某学术概念或学术范畴的结构维度/影响因素分析”这类从标题就看出不是扎根理论的“扎根理论研究”充斥着学术资源库;“三级编码”“NVivo”等与扎根理论方法论无关的技术操作成了方法的代名词;对“扎根”望文生义的解读大行其道。扎根理论方法在被肢解,“碎片”被研究者随性拾拣、随意涂鸦,而后镶嵌在不同的研究中,归之为扎根理论。本文指出了这拾取、涂鸦、镶嵌过程背后的历史根源、方法惯习和逻辑动因,以期帮助研究者更有辨别力、判断力地使用方法,进而充分发挥扎根理论的方法论优势,面向社会关键领域做更多有价值、有效用、接地气的研究,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服务国计民生。

一、扎根理论方法误用之历史溯源

扎根理论是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在进行一项关于住院死亡体验的研究中探索出的一套研究方法,1965年该研究的成果之一《死亡意识》一书出版,书中阐释的意识情境理论(awareness context theory)掀起了一波研究热潮,研究者对产出如此精良理论背后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回应学界期待,格拉泽与斯特劳斯在1967年出版了《扎根理论的发现:质性研究策略》一书(后文简称《发现》),首次系统阐述该研究方法,因该方法关注的是如何根植出理论(grounding theory),即理论中的

[收稿日期]2022-03-15

[作者简介]陈尹(1990—),女,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质性方法与社会心理。

概念必须基于所探究的实质领域的资料产生并与研究对象相关,而非关注如何验证某个理论猜想,故被命名为扎根理论方法^{[1]2}。

虽然格拉泽和斯特劳斯被认为是扎根理论方法的共同创始人,但两人在方法创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斯特劳斯和科宾(Juliet Corbin)从一开始就承认,是格拉泽首先意识到了有必要为编码以及在研究中对生成的假设进行检测而建立一套深思熟虑的、表述明确且系统的程序^{[2]25}。

得益于过往从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赫伯特·海曼(Herbert Hyman)及汉纳·塞尔温(Hannan Selvin)等人接受的方法训练之启发^{[3]125},格拉泽向斯特劳斯提出了将《死亡意识》的产生过程写成一套方法论的想法,斯特劳斯欣然同意但紧接着就去欧洲展开了一次长程旅行,期间格拉泽完成了该书的90%,即所有关于方法的八章内容,而斯特劳斯作为共同作者在旅行结束后对这八章内容作了审阅、增补,并撰写了前言、质性资料的储备库以及理论发展与展望三章内容^{[4]22}。这也为斯特劳斯后续的方法论偏离找到了历史根源。

1967年的《发现》是介绍方法论的开创性专著,但一本书显然无法将这一复杂方法阐释详尽,从1978年开始,格拉泽通过社会学出版社(The Sociology Press)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扎根理论方法论专著(参见表1),对《发现》中提出的扎根理论方法做了进一步解释、澄清、答疑解惑、举例说明,50余年一以贯之直至去世。

表1 格拉泽后续扎根理论方法论专著

书名	出版年份
<i>Theoretical Sensitivity:Advances in the Methodology of Grounded Theory</i>	1978
<i>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Emergence vs. Forcing</i>	1992
<i>Examples of Grounded Theory:A Reader</i>	1993
<i>More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A Reader</i>	1994
<i>Grounded Theory:1984 to 1994</i>	1994
<i>Doing Grounded Theory:Issues and Discussions</i>	1998
<i>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Conceptualization Contrasted with Description</i>	2001
<i>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II:Description's Remodeling of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i>	2003
<i>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III:Theoretical Coding</i>	2005
<i>Jargonizing: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Vocabulary</i>	2009
<i>Memoing:A Vital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i>	2014
<i>Applying Grounded Theory:A Neglected Option</i>	2014
<i>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Its Origin and Growth</i>	2016

斯特劳斯虽同为扎根理论方法的创始人,但1990年他与科宾合著的书籍中所阐述的方法操作已经背离了原创扎根理论方法论的某些根本要义,例如研究者不再等待理论性编码从资料分析中呈现出来,而是自己预先设定了一种理论编码来框揽资料,抹杀和屏蔽了其他的理论可能性^[5],并将研究者的理论视角、观点经验、学术文献凌驾在了“研究对象的关切”之上,这显然已经违背了扎根理论方法强调的“自然呈现”^{[6]41}和“关注研究对象之关切”^{[4]115}的原则。与格拉泽的独立学者身份不同,斯特劳斯和科宾具有明确的导学意图,是博士生对获得扎根理论方法详细指导的需求催生了两者共著的《质性研究基础》一

书^{[7]724}, 书中的做法确实让学生(尤其是初学者)提高了研究速度, 但遗憾的是扎根理论方法也因此演变成了刻板的程序和学术工具。

同时接受过格拉泽和斯特劳斯指导的学者西蒙斯(Odis Simmons)在比较两人的著述后指出, 尽管斯特劳斯使用了《发现》中的一些术语(如持续比较、理论性抽样等), 但他在阐释这些术语时却与阅读《发现》时获得的关于扎根理论的理解不一致了^{[8]15}。在后续版本的《质性研究基础》中斯特劳斯和科宾终于开始承认, 他们从第一版《质性研究基础》开始所阐述的方法已经不是格拉泽与斯特劳斯原创的那个扎根理论, 而只是斯特劳斯自己的研究方式^{[9]10}, 是另一种扎根于资料以建立理论的方式^{[10]viii}; 在第三版中科宾甚至在定义“扎根理论”时直接表明, 她在使用“扎根理论”一词时是泛指从定性的数据分析中衍生出理论结构^{[10]17}。

然而, 斯特劳斯和科宾在承认自己的方法不是“扎根理论方法”而是另一种基于资料建构理论的方式的同时, 仍然将自己的方法命名为“扎根理论”, 这无疑给扎根理论方法的学习者和使用者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学界不得不以“版本”加以区分(例如格拉泽版本扎根理论和斯特劳斯版本扎根理论)。显然, 这种区分无视了两者在本质上的不相容乃至相悖, 并且诱导出了更多的“版本”“范式”“流派”。更糟糕的是, 试图学习该方法的研究者很自然地陷入了一种时间的进步主义脚本, 认为这些“版本”“范式”“流派”的出现是在遵循一种进步叙事, 最后阶段的版本代表“更好的”版本。方法论原始文献的阅读变得没有必要, 咀嚼二手乃至 N 手方法文献而后依葫芦画瓢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扎根理论研究的常态。

二、现实表征: 冠以“创新”和“本土化”的方法破坏

作为扎根理论方法的原创者之一, 斯特劳斯对扎根理论方法论的背离以及对这一特定方法称谓的随意化使用, 无异于将辛辛苦苦从质性研究的假设验证和印象派理论产出两种传统分析路径中脱离出来的第三条分析路径(且不同于质性“分析归纳法”^[11], 重新抛回了茫茫质性分析之海。扎根理论方法被肢解并成为一个极为广义的标签, 为无法被命名的质性分析和理论建构提供历史合法性。当使用这一标签的研究者意识到自己的方法不同于扎根理论方法时, 也效仿了先驱斯特劳斯的做法——在扎根理论之前自创“前缀”, “创新”和“本土化”之冕不仅为这些方法论背离轻轻松松提供了现实合法性, 还使研究者显得更智慧, 成为了扎根理论现实使用中一种趋之若鹜的学术操作。这些“改版”、附加的“视角”或“主义”实则都在不同程度、不同维度上偏离了方法的原初目的^{[8]14}, 且大部分偏离属于退化式方法破坏。

(一) 质性研究的“深描”嫁接

质性研究往往在研究结果上追求精确的描述和细节的呈现, 但扎根理论并非如此^{[12]187}。将质性研究的“深描”旨趣嫁接到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中是对方法目标的根本违背。扎根理论存在于概念层面, 由假设集成(composed of integrated hypotheses), 而质性分析追求的是描述或者描述与概念描述的混合(description with or without conceptual description mixed in)^{[13]2}。质性研究具有强烈的“深描”倾向^[14], 通过缜密的细节呈现资料, 从而表现出研究对象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动机等各方面^{[15]8}。例如, 叙事研究会发展出一个关于个体人生故事的时序叙述(即围绕某个主线而展开的故事^{[16]5-6}), 现象学会

形成对“受访者的生命世界及其自我经验解释”的描述^{[17]14},民族志会为读者提供关于某个文化共享群体运作方式详细的、动态的、情景化的描绘^{[18]1},个案研究会使用叙述、图表等形式对某个或某些个案进行详细的分析性描述,以及探讨从中可获得什么经验^{[12]107}。在许多自称扎根理论的研究中,研究者形成的只是若干描述性概念或主题,常见的做法是对概念进行一定的解释后开始罗列原始资料作为证据。对质性研究者而言,在扎根理论研究中进行“深描”是非常“顺手”的惯习,甚至是一种无需意识参与的程序性记忆。然而,扎根理论的方法旨趣并不在深描或讲故事,而是在于通过系统应用一整套扎根理论方法进行同步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去归纳生成抽象概念化的理论^{[6]31}。质性资料分析通常需要尽可能准确地描述资料,通过精确的深描来提供证据或者让研究对象发声(give voice to the participants)^{[13]5},要求尽量使用研究对象的本土概念或者说内生概念(in vivo concepts),即研究对象所使用的词汇,以保留资料的“原汁原味”^{[15]284}。虽然扎根理论中也会使用内生概念,但并不用于为研究对象发声,也常常不会成为构成理论的关键概念,因为在扎根理论研究过程中,这些内生概念常常只是研究对象基于某一个事件给出的印象式概念甚至无根据的想法,不属于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完全从资料中生成的概念,也不是对某个明确模式的适恰命名,相应地,邀请参与者检验理论是否代表他们的心声这种效度检测方式也不适用于扎根理论^{[13]11}。扎根理论强调的研究对象的主要关注(main concern)并不是质性研究中所说的“参与者的声音”(voice of the participant),而是关于资料中表征出来的研究对象行为模式的一种概念化视角,研究对象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或者只是在事件描述层面有所意识,但资料显示他们始终在忙着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会对其中的模式概念化,也不需要做这些,因为这是研究者的工作^{[13]99-103}。当下广为传播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就存在典型的深描嫁接问题,该方法的目标包含了对参与者经验的精确化描述,即力图描绘和解释参与者如何建构他们的现实并呈现出多重视角,因此它通常以研究者对所研究的社会过程的阐释性理解作为结论,并以“故事”描述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对精确描述的旨趣已经违背了扎根理论真正追求的概念化目标^[19]。

将“主题归纳”等同于扎根理论的概念化和理论化过程也是对方法目标的极大误解。与上文提到的深描相比,在扎根理论研究中进行主题归纳的错误做法显得更隐蔽、更具欺骗性,因为它将资料描述收拢在了一定的主题维度或者逻辑框架中,使它具备了整体理论的表征,而初学者很难识别这种理论表征与扎根理论之间的本质差异。笔者看到过很多声称使用扎根理论方法的研究在方法介绍中使用的却是质性研究的“归类分析”方式,如类属分析、情境分析^{[15]289}。格拉泽早在1965年发表的“质性分析的持续比较法”一文就已详细阐释了形成扎根理论的核心方法——持续比较法,它是用来生成充足理论概念的扎根理论独创程序^{[1]3},甚至常常被作为扎根理论的同义词在使用^[5]。质性研究中的“分析归纳法”(analytic induction)由于也具备对资料进行分析编码并形成整体理论的表征,因此非常容易与扎根理论分析方法相混淆。“比较”是所有研究中都会使用的基本方法,但扎根理论的持续比较法在将这一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且具有鲜明科学风格的一般过程明确提取出来的同时又改变了一般比较的结果产物,持续比较法的目的是生成概念而不是通过分析归纳的一般比较生成全面准确的描述^{[13]186}。分析归纳法中概念产生遵循的是归类汇总模式,例如关于孩子学习经历的资料可按照小学、初中、中专时序归类,抑或按照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家长提供的外部条件、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进行主题归类^{[15]301}。

而扎根理论中概念的产生是基于概念—指标模式(concept—indicator model)(如图 1),即对一组经验性指标的概念性编码。其中涵盖了两种持续比较过程:(1)指标与指标进行比较,基于此生成某个概念化编码;(2)此时再将这个出现的概念与更多的指标进行比较。从指标与指标的比较开始,分析者就必须处理指标之间含义的相似性、差异性和一致性程度,这将产生一种潜在的统合继而形成某个被编码的范畴及其初始特征^[4]。以笔者一项失独研究中的概念比较片段为例,一位计生社工在谈到社区失独群体时说到:

他们过年的时候有个补助,要求是上门去送这个钱,做一些慰问。我们社区有几位失独者都是不让上门的,他们都要自己来拿这个钱。当时对他们做些调查,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心理上的服务需求或者物质上的需求,他们也非常拒绝,不希望我们这些人去打搅他们,所以对于他们的很多具体情况我们也不好问。

在上面这段访谈内容中可以看到,访谈对象是在讲述与失独群体的互动情况。笔者对这段资料中不同经验性指标进行比较后形成的暂时编码包括“试图与失独者建立服务关系”“拒绝服务”“尊重失独者意愿”,这些编码目前还不够抽象化,但通过和其他资料中更多的指标进行持续比较,研究者会逐渐形成更加抽象且复杂的概念以及概念特征。例如在另一份社工与失独者互动的资料中,研究者通过对已形成的概念和新资料中的指标进行比较,形成了另一些不同概念:“评估恢复情况”“服务试探”“活动试探”,“调整交往方式”“避免情绪失控”“迁就需求”等。同时通过比较“评估恢复情况”“建立关系试探”“服务试探”“活动试探”发现它们可以作为不同的试探类型归入同一个更抽象的概念“试探”;“调整交往方式”“避免情绪失控”“迁就需求”“尊重失独者意愿”则不属于“试探”的概念范畴,但可以形成与“试探”区别开来的另一个概念“顺从”。通过“顺从”与“试探”之间的比较,我们可能会形成一个更加抽象化的概念,例如“顺应”。因此,这段材料的各种指标都纳入了“顺应”这个概念,这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统合的编码范畴及其初始特征。对未被纳入“顺应”的概念(如“拒绝服务”),则可能在其他资料或概念比较中被纳入其他的概念范畴。但是这些概念及其特征、维度都是暂时的,所使用的概念“优劣”也是相对的,概念会在研究深入的过程中不断被修正和完善,在不断比较的过程中,新的事件可能被归入已有的范畴或范畴特征作为同一概念下“可相互转换的指标”(interchangeable indices),也可能产生新的概念或特征,参见图 1^{[2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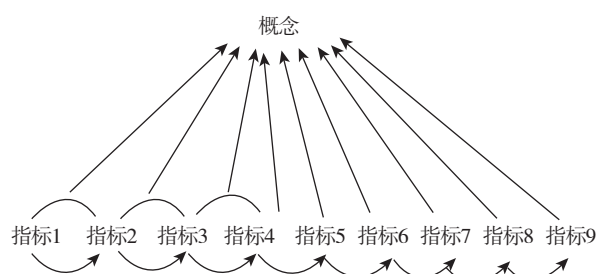


图 1 概念—指标模式

(二)假设演绎思维的方法渗入

假设演绎思维是指通过提出问题、做出假设、演绎推理、验证假设的过程来评价和发展理论的思维方式。可以说现代实证科学的发展正是由该思维方法来推动的。它的目标是控制和预测现象的普遍决定论规律,因此,研究者会将现象作为密闭系统来处理,对现象的相关信息隔离、收集和分析。这对于自然科学中部分简单现象可能尚具有一定

的解释力,但在面对人类复杂系统时就暴露出了明显的缺陷。现实世界是非机械决定性和非统计性的,而它无法充分解释真实社会系统的这种复杂性、自反性和不确定性。假设演绎思维就像传统学术共同体内代代相传的基因,一旦研究者处于学术惯性中而对此缺乏觉察和控制,它就会在不同程度、以不同形式渗入扎根理论研究中,阻断自然呈现之路。以下列举几种当下常见的渗入方式:

1.先入为主的研究问题和文献

质性研究通常会在着手研究之前进行详细的文献综述,分析前人的研究状况、研究方法、研究特点、研究局限等,从而进一步陈述本研究的动机、提出研究问题^[21]。这一做法普遍存在于很多声称扎根理论的研究中,在学术平台随意搜索就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某个学术概念或学术范畴的结构维度、实现路径、影响因素等的扎根理论研究,但这类研究问题不是扎根理论要研究的问题,因为它是预设的而不是生成的,是学者关心的问题,而不是研究对象关切的问题。扎根理论并不是没有研究问题,而是将研究问题作为了研究的一种结果,研究者只带着朦胧的好奇心直接进入研究领域^{[20][24]},去发现研究对象所关注的问题以及他们在解决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的过程中潜在的行为模式^[22]。虽然不带问题进行研究会让人感到恐惧和失控,但如果研究者能充分相信自己和方法,未知的状态将会让概念和想法更加开阔而鲜活^[23]。

在不带问题进行研究的情况下,进行先行文献的搜索是盲目和徒劳的,因为研究者根本不知道该查阅哪方面的文献,而为了概念、问题和理论自然生成,研究者也必须悬置任何先有的来自文献或者专业的知识以保持开放的思维(open mind),因为先前的知识会削弱和危害分析者形成在之前文献中没有的新的概念的能力^[24]。有研究者会以“开放的思维不等于空空的头脑”^[25]为由进行先行以及持续的文献查阅,这极易阻断自然呈现之路。研究者的头脑当然也从来不是空空的,但负载研究者个人经历和经验的头脑与被文献归置过的头脑显然不同,个人经验多是具象的、经验的、感受性的、零散的,而文献中的概念理论、知识框架则是抽象的、结构化的、逻辑性的、符合某种学术话语体系的。负载个人经历和经验的头脑对于任何一项扎根理论研究来说都是必须的,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者的敏感性^[26],研究者会通过自省备忘的方式将之纳入资料的比较和分析,但这些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并不必然构成理论内容,因为这取决于它与其他资料的关联性^[27]。而文献中的概念和理论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对扎根理论的概念维度、理论生成的影响是系统且直接的。常有研究者在运用扎根理论时无法忍耐漫长的分析和等待,最终将半成品的编码依附在某个现有的理论框架上进行理论演绎(如依恋理论、需求理论、身份认同理论等),强行用理论框架解释了资料。文献后置正是为了避免过早地陷入某种话语体系,扎根理论之“理论”是要建立一种新的话语体系,用一套从资料中呈现出来的、紧密贴合的概念范畴去阐明研究现象中潜在的社会过程机制。

2.演绎式抽样

在质性研究中对抽样常常存在多样化的表述^[28]。许多文献中目的性抽样(purposeful sampling)和理论性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甚至被视为同义词交替使用^[29],这对理解扎根理论独有的“理论性抽样”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有研究者声称使用的是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但连该方法最基本的理论性抽样都没有真正使用^[30],或直接以

“目的性抽样”替代“理论性抽样”，或对“理论性抽样”进行望文生义的理解。要厘清目的性抽样和理论性抽样的关系，需要先对“目的性”有所界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慎重的取样，甚至包括随机抽样，都可以声称是目的性的^[28]，切因(Chein)就将随机抽样包含在了目的性抽样的范畴中^{[31]418-441}，这是对“目的性抽样”最广义的界定。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不同的研究范式中，质性研究的“目的性抽样”指的是取样过程并非随机，是与量化研究取样相区别的一种“非概率性抽样”，这是对“目的性”较为狭义的界定，在这个界定范围内，所有的质性研究都是目的性采样，扎根理论也是。而在质性研究具体的方法论中，目的性抽样通常指的是识别那些拥有某些特质或者生活在与研究现象相关环境中的特定人群，选择信息丰富的个体进行深度研究^[21]，研究者需要在开始访谈之前去推测谁会是最合适的信息提供者，基于某些特性、结构或维度仔细选择信息提供者。这是对“目的性抽样”最狭义也是最普遍的界定，在这个层面上，扎根理论的“理论性抽样”与质性研究的目的性抽样存在很大区别。

狭义的目的性抽样属于演绎式抽样，需要根据预先形成的、合理的若干维度有计划地取样，与此相反，理论性抽样则没有这种预先的计划决策。理论性抽样，顾名思义，抽样的过程不受预设限制，而是受形成理论的需要驱动，是为了使概念和范畴在资料分析过程中自然呈现出来而对特定资料来源进行抽样^[32]，因此理论抽样的过程会贯穿整个扎根理论研究，直至收集到的新的信息对所探寻的概念及其特征的发展不再有帮助(理论饱和)^[28]。在旨在描述性捕捉(descriptive capturing)的质性研究中可能会使用的反例或偏差抽样、极端样本抽样、最大差异化抽样等策略不会在扎根理论中使用，反之则会让扎根理论研究误入描述性比较的歧途。理论性抽样是对任何通过比较可能产生新的范畴特征的事件进行抽样，“差异”是理论性抽样后通过比较呈现出来的，而不是抽样之前预设出来的^{[13]169}。

3. 演绎式编码

最典型的演绎式编码是斯特劳斯和科宾式分析程序。扎根理论研究要求所有的一切都必须通过持续比较“自谋”(earn)路子进入理论，而不是从其他口径直接输入^{[27]17}，研究者要耐心“让资料自己说话”^{[33]8}。而斯特劳斯和科宾式分析虽然也提到“让资料自己说话”，却是另一种含义，指的是在微分析(microanalysis)阶段通过突破常规的资料解读方式，对每一个词句可能存在的含义进行的穷尽探索^{[9]59-60}，以帮助研究者开阔分析思路，类似于进行“头脑风暴”^{[9]147}。例如，在开放式编码时，斯特劳斯和科宾要求有意地去检查和寻找每一个范畴属性的维度，当看到“从不”这个概念时，要有意识地考虑“有时”“偶尔”等其他维度，从而将属性定位在一个连续体上(称作维度连续体)，使每一个范畴都具有一个复杂的维度轮廓。这种过度演绎导致了很多并不重要甚至不必要的维度被拉进理论，这样的理论可能是全面的，但不再是最贴切、最有用的。在他们提出的主轴编码中，这种演绎性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所谓“主轴”实际上是斯特劳斯和科宾提出的一种框架范式，主轴编码就是通过显性或者隐性地使用这种范式来组织资料以阐明范畴之间的关系；主轴的构成包括：现象、引起这些现象的因果条件、现象所处的情境特征、对所研究的现象产生影响的中介条件、行动主体应对现象所采取的行动或者互动策略、他们行动和互动的结果^[25]。这种演绎式编码完全抛弃了自然呈现的原则，概念的产生被设定在一个事先确定

的计划里^[34],资料被“硬塞”进“预想的”概念中,最后强行促成了一个理论,丢失了资料的本真^{[20]9},并使扎根理论窄化为一个公式化的程序^{[7]724}。

4.预设理论视角或立场

针对某个问题引入新的理论视角或立场是学术创新的经典方式,也是研究成本较低的一种创新,极大地依赖于学者的联想能力和捕捉新思想新观点的能力,但这种“创新”通常更像是一场学术界自娱自乐的语言游戏。扎根理论这个从现实研究中归纳生成的平民方法^{[8]16}在进入学术讨论空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拉入了学术语言的游戏,进而被强行归入或预设了某一种哲学立场、理论视角,五花八门的立场包括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等。但是,这些主义都来自“科学”的推测性智慧(conjectural wisdom from science),告诉人们科学“应该”是怎样的,而扎根理论不是这些“逻辑”科学的产物,这个方法是在研究临终病人过程中发现的方法,而不是被发明出来的方法^[24],它并不适用这种学术思维的演绎游戏,因为“现实世界是经验性集成而不是理论性建模,而扎根理论旨在发掘这种经验的集成性”^{[35]83},它无法事先捆绑于以上任何一种哲学观点和理论框架^[36]。例如,当我们预设一种建构主义视角时,研究者的建构会被刻意地设计进研究过程,这种刻意设计不恰当地将研究者提升到了共同创造者和故事设计者的地位^[19],但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这种盟约关系,尤其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常常“非植根于参与者的日常生活”^{[37]193}。人类活动具有建构性并不等同于研究者要在具体现实关系中成为他人生活的建构者。扎根理论要做的是“让资料自己说话”,而不是让研究者、理论家和思想家的推测与想象说话^{[8]14},研究的立场、逻辑、概念、理论产生于具体的研究,只有待它们从具体的资料中呈现出来才可知。

(三)“三级编码”和“NVivo”的技术误导

上文中提到的两种误用表征是不分语言、不分国界的通误,还有一类误用是在国内翻译引介过程中产生的。最典型的就是“三级编码”这个“本土化”概念的使用和失控。笔者翻阅了大量国外文献,没有在任何扎根理论专著中看到著者将资料分析过程称为“三级编码”,但在国内最早引进扎根理论的方法教材中却无中生有了这种表述。首先,编者^{[15]332}在引介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时,并没有参考1967年原创的扎根理论,而是直接介绍了斯特劳斯和科宾的误用版本(这可能也是后来该版本在国内被广泛使用的原因);其次,即使是对斯特劳斯和科宾版本的引介,编者也并没有忠于原著,而是“本土化”地给不同类型的编码起了另一套名字:一级编码、二级编码、三级编码,编者自创的概念与直接引用的原著内容就这样混杂在一起送到了广大国内读者面前。该类“本土化”表述显然很符合中国学者的使用习惯,简短易记又具有一定的技术表现性,因此产生了极强的学术传播力,在国内几乎成为了扎根理论方法的代名词。

这种“本土化创新”简单粗暴且极具误导性。编码作为动词指的是研究者对资料进行分解和概念化,从资料中获取和发展概念的过程;扎根理论的编码包括:开放性编码(open coding)、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和理论性编码(theoretical coding)^{[33]55},三者属于不同的编码阶段和类型,有着不同的操作目的,并不属于同一评级范畴。编码作为名词则表示通过编码发展出来的能够代表资料的概念。“三级编码”的误导性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它将作为名词的编码误导成了刻板的三个层级。概念确实存在抽象化水平的高低。研究者对资料的认知水平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原始资料;第二层级是将资料概念化为范畴及其特征,在这个层级中还存在一些子层级,例如核心范畴、子核心范畴、范畴、子范畴、范畴特征等等;第三个层级是整合成的完整理论^{[4]136}。研究者认知水平虽然可以

笼统地概括为资料—概念—理论三个层级,但正如在第二层级认知中所列举的,概念本身的抽象化水平远不止三级。其次,“三级编码”将作为动词的编码退化成了套娃式三级归纳。有大量研究者被误导,以为扎根理论就是通过第一级编码形成大量零散概念,再通过二级编码对这些零散概念进行萃取和整理,获得若干聚焦概念,最后通过第三级编码归纳形成“精华”的几个主题概念。用来生成充足理论概念的扎根理论核心程序——持续比较法并没有被纳入分析过程,扎根理论成了对资料进行“三步走”式的归纳中心思想。研究者也因此重新陷入了传统质性研究高度个体化的、印象派的、过程隐晦且模糊的方法窠臼中。于是,陷入窠臼的研究者们开始对这些不同层级编码在原始资料中出现的频次以及编码数量进行计数、让不同的研究者各自编码计算“一致性系数”、将编码交给参与者和非参与者检验得出描述性效度和解释性效度,试图通过资料覆盖度和普遍认可度的量化提高编码可信度、通过编码数的层层递减证明分析过程的有效性。显然,研究者投入了量化实证的怀抱寻求接纳。

为了使“三级编码”显得更现代化、更科技感、更受量化研究者青睐,研究者通常还会引入某种分析软件,其中 NVivo 的使用最为普遍。在软件公司、部分学者和各种推广平台的联合营销下该软件几乎已经与扎根理论形成了捆绑关系,甚至像“三级编码”一样,成为了方法的代名词,并催生了大量以快速生产论文为诱饵的研习班、培训班。NVivo 等软件本质上只是质性研究中可以选择性使用的辅助性收纳软件,既不具有方法特供性,也无法进行实质意义上的资料分析。大部分研究者使用到的功能也只是储存资料、建立索引、搜索信息、各种量化计数,这些功能几乎不是扎根理论研究必须的,且软件中自带的一些术语和功能还会误导研究者,将研究程序导向简单化、模式化。研究者实在没有必要花上万元为扎根理论研究买一个枷锁,大部分可以用到的软件功能,Word 和 Excel 就能免费提供。

像这样声称是扎根理论研究,实际在做传统质性分析,但又在迎合传统量化评价指标的研究近年来被大量产出和传播,甚至已经形成了某种默认的写作发表套路,颇有劣币驱逐良币之势。

上述方法误用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首先,“质性深描”使方法的理解和评估变得异常困难。不同研究旨趣和研究目标的嫁接,使同在“扎根理论”名称下的研究缺乏统一的话语体系,难以实现共享和讨论,更无法在同一标准下评鉴。这在初期会造成鱼龙混杂、人言人殊的研究局面,而在后期则会逐渐异化,学术权力和资源掌握者将优先获得话语权并作为裁判决定研究优劣。此时,如何真正掌握方法做出有价值的研究会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进入某个学术圈子,投其所好,获其背书。这对整个学术生态和学术环境将造成极其恶劣的破坏。其次,“假设演绎”使理论产物缺乏可用性。假设演绎思维使学术层面的关切高于对真实世界的关切。复杂开放且极具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被切片为线性的、决定论的若干假设和推论。由此得出的理论产物常常听起来很“科学严谨”,但缺乏对人类复杂现象的解释力,也无法真正应用于日常情境。再次,“技术误导”使研究流于形式套路。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技术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能让一项研究看起来既“高大上”又“科学”,让研究者看起来既“专业”又“前沿”。但这些特质并不是一项扎根理论研究需要追求的。技术语汇和软件更像是一块遮羞布,掩盖了研究者方法训练的不足,并将读者的关注点转移到了无意义的技术说明上。购买最新版本的某软件,娴熟使用某些技术概念、软件功能被等同于掌握和应用了研究方法,这将导致研究形式重于内容,产出大量缺乏吸引力、缺乏深度的常识概念和理论。

三、回归本源：扎根理论方法内核

列举了种种现实中的误用表征,试图使用该方法的人可能会产生束手束脚、不知所措之感。实际上,完成一项扎根理论研究是一件极具创造乐趣和惊喜的工作。研究者只需回归本源,把握其根本目标,遵循其基本原则,实现其正本操作,研究对象和资料就会带领你去往你不曾想象到的世界。

(一)把握根本目标:生成抽象概念化理论

如果从一种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何为“理论”的话,建立理论并不是扎根理论方法独创的目标,很多研究方法都具有形成理论性理解的目标旨趣。如果作进一步细分,不同质性研究的结果可以大致区分为描述、概念整理、理论化三种类型^{[9]9-15}。“描述”是用文字传达某个事件、风景、场景、经历、情感或者感觉的心理意象,旨在通过非常形象细致的描写来讲故事,但不会回过头来去解释事件的发生;“概念整理”则根据一些明确的维度对事件和事物进行分类,包括根据某些特征和维度进行分类,或者根据一些特定的步骤或阶段对资料进行排序,抑或根据不同类型的行为主体(包括人和组织)或行为组织资料,但是“概念整理”不会将这些类别彼此关联以形成一个整体的解释性框架;“理论化”则是对“概念整理”的超越,前者通过关系陈述将发展完善的概念联系起来,共同形成一个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的整体框架。从广义上来看,描述、概念整理、理论化都可以被认为是区别于粗糙的原始资料的一种理论性表达,但正如在上文历史回顾中提到的,“从对定性的数据分析中衍生出理论结构”等基于资料建立理论的方式并不能与扎根理论方法画上等号,扎根理论方法论(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在其独创之时,已经对其“理论”之目标意涵有了更狭义更明确的界定,使之与其他研究所追求的广义“理论”相区别,并将之作为方法的一个核心特质直接凸显在了方法称名中。

扎根理论之“理论”虽来源于资料,但不描述资料,它将更多的焦点放在概念的适恰性和概念间的关联性上^[19]。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是扎根理论的核心过程,概念是对研究中潜在的社会模式进行的命名(naming of a social pattern)。概念化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概念在时间、地点、人物上的抽象化,二是概念作为一种看待事件的实用方式具有持久的吸引力(enduring grab)^{[13]4-5}。在谈到扎根理论与其他研究的区别时,格拉泽认为扎根理论“其实并不复杂,很直接和简单,你要做的就是去寻找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解释着研究对象的核心关切,你将这些模式命名出来。所谓模式指的是人们为了解决他们的核心关切所采取的行为”^[22]。

(二)遵循基本原则:自然呈现

在扎根理论方法中,“自然呈现”是确保理论完全扎根于资料的一项基本原则,可以说,该方法中的所有环节,从研究的进入、资料来源、资料分析方法、抽样过程到理论性编码的呈现、研究问题的产生、文献的使用等一系列操作规则和顺序设置都在为保障这一基本原则而努力。

扎根理论研究并非传统的学术训练,两者存在很大的区别(参见表2)。传统学术训练往往从文献出发、以现有理论为锚点、以演绎推演为逻辑、以事实资料为佐证进行理论的批判、发展或整合,而在扎根理论研究中,任何文献和现有理论都不具有根基性和优先性,研究者也不具备“专家”身份,研究问题、样本、概念、理论、所需查阅的文献都必须自然呈现。扎根理论研究者必须非常清楚并把握好这些区别,以保证实现研究目的和生成理论,并将这些处理明确地呈现给读者^{[33]12}。

表 2 传统学术训练与扎根理论研究的基本区别

传统学术训练(scholarship)	扎根理论研究(analysis)
阅读、学习和记忆观点	思考和形成观点
旨在表达正确的观点	观点的试探,并非总是正确,但要贴合资料
就观点进行争论	对观点提出建议
批判——极具评价性	为帮助产生更好的观点而批评
拿来观点	谋来观点——从资料中产生、贴合资料
观点的出处(“学术大佬”)比观点更重要	研究者贴切的观点、从资料中产生的观点比学术观点更重要
用假设演绎逻辑来理解资料	从资料中获取或归纳出逻辑,待观点呈现出来后再将此逻辑用于理解资料
钟爱指出其他研究的欠缺,然后提出另外一个	利用现有的资源开展工作,不必为自己的欠缺抱歉
全面的学术文献覆盖——不可简省	理论性覆盖——只涉及有效的观点,越精简越好
追求全面导致学术封闭	理论性覆盖只是部分封闭,总有新的观点使理论更有效并调整理论
受到领域、范畴、主题、思想或人物流派等传统界限的约束	超越传统分析、理论和范畴的界限
对生成性存在限制、教条和传统约束	开放、自由、不受传统约束,更具生成性

资料来源:Glaser,Theoretical sensitivity: advances in the methodology of grounded theory[M]. Mill Valley, CA: The Sociology Press, 1978:11—12.

(三)实现正本操作:应用整套方法

扎根理论方法通过限定其根本目标(抽象概念化)和实现目标的基本原则(自然呈现)界定了方法论,实现了方法的独立性和特异性。研究者选用扎根理论的前提必然是对其内核要义的认同,这也意味着该方法的使用不可能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anything goes)^[38]。格拉泽将扎根理论界定为“一种系统应用一整套方法进行同步的资料收集和分析从而生成关于某个实质领域的归纳性理论的综合性的(general)方法论”^{[3] 16}。有研究者可能会觉得强调整套方法的应用限制了研究的自由,研究者无法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开展研究。这里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在一项研究中谁的自由是需要被限制的? 谁的自由是该被保护的? 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此可能有不同的回应。在扎根理论中,研究者的哲学立场、专业理念、演绎推测、个人偏好以及专家学者的理论范式、框架模型、术语概念是被限制和后置的。正因为这些失去了自由,研究对象和资料才获得了充分的表达和呈现。研究者对自身每一份轻松自由的索取往往都在牺牲研究对象和资料的自由。而扎根理论方法整套程序正是在竭尽所能、毫不松懈地保护这份“让资料自己说话”的自由。

四、正己之道:研究新手如何避免误入歧途

在“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体制下,在正统式微、鱼龙混杂的扎根理论研究背景下,研究者想保持清醒其实很难,需要有使命担当的研究初心、追本溯源的好奇心、探究学习的诚心、对名利诱惑的戒心、踏实做研究的耐心和不畏威权的勇者之心。如果研究新手打算使用扎根理论方法,且不希望走入上文种种误区,笔者以为有以下正己之道可供参考。

(一)明确初心,匹配恰当方法

并不一定非得用扎根理论。研究者首先要确定所研究的问题是否适合特定的研究方法论,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的能力个性、研究的目标旨趣与方法论要义之间需要良好匹

配。方法论是“选择和使用特定方法背后的策略、行动计划、过程或设计,并且通过这种对方法的选择和使用来达到某种期望的结果”^{[39]3},有很多方法(例如民族志、叙事探究、现象学、个案研究等)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建立了各自一套完整独立且风格鲜明的方法论体系,即使像“文献综述”“抽样”“访谈”“观察”“备忘”“编码”“资料分析”“建立理论”这些普遍使用的术语,在不同方法论体系下的涵义和操作程序都有极大的差异。不同方法论之间并不存在好与坏的问题,研究者只是基于对研究兴趣、研究目的和自身能力的反思做出相对适恰的选择。这种选择的根本动力可能来源于不同研究者关于“研究应该是怎样的?”“什么样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应该怎么做研究?”的不同学术信念。扎根理论并不一定是最适恰的方法。如果研究者想要去捕捉单独或少数个体详细的人生故事或者生活经历,叙事研究可能更适合;如果想深度地理解参与者关于某个现象的共同的体验以及这些体验对于参与者的本质意义,现象学可能更适合;如果旨在描述一个文化群体的运作方式以及去探索他们的信念、语言、行为和群体面临的议题(例如权力、反抗等),民族志可能更适合;如果想通过某个或某些个案去描述、解释或者探究一些复杂的社会议题,个案研究可能更适合^{[12]99}。扎根理论有其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包含了从研究设计、研究过程到研究结果呈现和评估的系统性思考,它的目标是具体而有限的,深描、演绎、验证被严格排除在外,如果研究者的研究目标中包含这些,那么考虑一下其他方法,有些方法可能正是以此为核心的。

研究者在选择扎根理论方法时也需要对自身状态和能力做谨慎评估。一方面,扎根理论研究的每个阶段都依赖于研究者的心理状态,包括他的技能、疲乏程度、成熟度、动机、生命阶段的兴趣点、对资料的理解和思考等等^{[33]2};另一方面,扎根理论方法论对自然呈现、研究者自治、概念化、抽象性,反对强制、迫切、急于求成、描述等的强调^[40],也意味着研究者自身需要具有概念化和归纳能力、理论敏感性、创造力和持久的耐性。因此,基于方法论要求进行自身能力培养和评估是研究者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通过长期练习和积累,研究者会逐渐发现自己在应对资料时变得越来越“高明”,越来越明晰该如何将资料概念化以及如何进行理论性表述。

(二)具身学习,融贯方法内核

具身学习是一种深度卷入的内涵式学习,指学习者充分利用自身的好奇心、主观能动性和感知能力进行追本溯源、实操练习、研讨交流三位一体的循环学习。具身学习注重身体的实践和体验,强调全身心的参与过程,它不是身心分离输入式的学习而是身心融合体验式的学习。学习者无法仅通过看几本书或者听几堂课掌握扎根理论方法,我们的身体必须同时参与学习的过程,真正尝试去做一项研究,置身于复杂的研究情境中,在认知、身体、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生成对方法的领悟(有时是顿悟)。具身学习不是停留在大脑和知识层面的学习,因此区别于望文生义、人云亦云的表层概念学习。举个表层概念学习最典型的例子,“扎根”这个词从中文字意上很容易理解为“扎根于基层”“扎根于田野”“扎根于自然情境”,如果停留于表层概念学习,扎根理论就容易被望文生义为扎根于自然情境开展田野研究,必须收集所谓的“一手资料”。但实际上扎根理论之“扎根”所强调的是研究的结果(理论)必须来源于资料,不可通过逻辑演绎和推理的方式获得^[41],所谓“资料”(data)并不仅限实地观察和访谈资料,在扎根理论看来,“一切皆为资料”(all is data)^[13],访谈、非正式的评论、观察、报告、手册、文件、报纸文章、表和图等等都可以作为资料来源^{[4]159}。在质性资料分析中常常为了确保资料的准确性而筛选资料来源,认为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直接获取的资料优于现成的报纸文章、纪录片、纪实报告等资料,后者是“被污

染”而存在偏差的资料。在扎根理论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偏差资料(bias data)、主观或客观资料、被曲解的资料,扎根理论认为这些正是研究者作为人类所接收到的^[19],而资料类型和来源的多样性也是研究中概念和理论解释力和适恰性的重要保障,不同类型的资料会给研究者理解某个范畴以及发展相关属性提供不同的观点或连接。在扎根理论研究中,世界是完全经验性的,收集资料时要做的就是处理正在发生而不是想要发生的,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旨趣获取理想的资料,资料不是“真理”(truth),也不是“真实”(reality),而只是正在发生的事情(what is happening),在其他研究看来“失真”的偏差资料,在扎根理论研究中通过持续的比较有可能会生成重要的变量^{[13]145-146}。

缺乏具身学习,上述误解误用难免层出不穷。具身学习是包括阅读原著、实操练习、研讨交流在内的循环学习。英文原著是不可替代的学习资料。即使对于母语是英语的研究者来说,阅读及彻底掌握英文原著也并非一件易事。追本溯源以及批判性地阅读英文原著是为了了解和把握方法论的要义、原则或者说精神内核,了解不同环节设计、操作设置与方法论精神内核的关联性、一致性、系统性。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需要通过研究实践边练边学,在“做”中理解和体悟该方法论的要义,这一过程是将知识融会贯通为自身技能的过程,例如“持续比较法”“理论性采样”“理论性编码”这些过程,如果只看书很难真正理解,必须通过在研究中切身操作才能真正明白其复杂内涵。阅读和实操过程中常常会面临迷茫和挫败,这时与方法学习的同伴、尤其是有一定方法经验的同伴进行研讨交流非常必要。研讨交流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认知和操作误区、明晰前进的方向、坚定前行的动力。当研讨中遇到分歧和争论时,再回到原著,通过进一步的阅读澄清困惑,并带着更清晰的认知进行实操,如此往复循环,逐渐融贯方法内核,提升方法使用水平。

(三)面向社会,服务国计民生

亟待创新和本土化的不是方法,而是理论,服务国计民生的理论。何谓创新?将游泳比赛场地改在跑道上是创新吗?对是否具有创造性的判断必须和人类的意义与实践传统相结合,一个人只有参与某种传统的历史,才能谈得上创造性。一个研究者只有在真正理解扎根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才有能力去谈方法的创新,将深描、演绎、验证等思维和逻辑引入扎根理论方法的创新无异于将游泳比赛场地改在了跑道上。扎根理论方法的创新逻辑应是:研究者在使用原创方法的过程中,发现其中的一些设计和操作不利于扎根于资料、不利于概念和理论自然呈现,进而提出更有利于研究目标有效达成的举措。而不是靠学者的思辨想象出创新点和本土化需要,更不应该是博人眼球,为创新而创新,为混合而混合的形式化追求。

国内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普遍存在“借理论”的问题,中国面临着很多特殊的疑难问题,从国外引进的理论在解释和应对这些中国特色问题时难免存在生硬解释、自说自话、脱离实际等问题,例如对失独心理的解释多借用哀伤阶段理论,但笔者在扎根理论研究中发现,哀伤并不是失独者最关注的问题,当事人也并不是在简单地按阶段开始和结束哀伤,按哀伤阶段进行心理指导就很容易造成伤害。面向社会复杂疑难问题,生成更具贴合性、解释力和实用性的理论正是当前国情之所迫、国民之所需。扎根理论方法产生之初衷就是让每一位普通研究者(而不只是权威人士)都可以提出非常棒的理论,可以说它是一种平民社会学。这也意味着,每一位学者都可以响应国之所需,在各自实质领域中开展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贡献力量,服务国计民生。此乃扎根理论创新之方向。

[参 考 文 献]

- [1] Glaser B G. 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its origin and growth[M]. Mill Valley, CA: The Sociology Press, 2016.
- [2] Strauss A L, Corbin J.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M]. CA: Sage, 1990.
- [3] Glaser B G.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emergence vs. forcing[M]. Mill Valley, CA: The Sociology Press, 1992.
- [4] Glaser B G. Doing grounded theory: issues and discussions[M]. Mill Valley, CA: The Sociology Press, 1998.
- [5] Hernandez C A. Are there two methods of grounded theory? [J] Grounded Theory Review, 2008, 7(2):1—14.
- [6] Glaser B G, Strauss A L.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 Chicago: Aldine de Gruyter, 1967.
- [7] Charmaz K, Thornberg R, Keane E. Grounded yheory: rvolving hrounded yheory and docial justice inquiry[M]. Denzin, Lincoln.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2018.
- [8] Martin V B, Gynnild A. Grounded theory: the philosophy, method, and work of barney glaser[M]. Boca Raton: Brownwalker Press, 2011.
- [9] Strauss A L, Corbin J.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2nd.ed.) [M]. CA: Sage, 1998.
- [10] Corbin J, Strauss A L.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3rded.)[M]. CA: Sage, 2008.
- [11] Glaser B G. 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of qualitative analysis[J]. Social Problems, 1965, 12 (4): 436—445.
- [12] Creswell J W.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3rd ed.) [M]. CA: Sage, 2013.
- [13] Glaser B G. 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conceptualization contrasted with Description[M]. CA: The Sociology Press, 2001.
- [14] Gliner J A. Review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posed criteria for fairness and rigor[J]. Occupational Therapy Journal of Research, 1994, 14(2): 78—92.
- [15]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 [16] [美]瑾·克兰迪宁. 叙事探究——原理、技术与实例[M].鞠玉翠,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17] 胡幼慧.质性研究:理论、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实例[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96.
- [18] [英]安·格雷.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M].许梦云,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 [19] Glaser B G.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 [J].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2002 (3):825.
- [20] [美]巴尼·G.格拉泽.扎根理论研究概论:自然呈现与生硬促成[M].费小冬,译.米尔谷:社会学出版社, 2009.
- [21] Isaacs A N. An over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public health researchers[J]. Int J Med Public Health , 2014 (4): 318—323.
- [22] Walsh I, Holton J A, Bailyn L, et al. What grounded Ttheory is...a critically reflective conversation among scholars[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15(4): 547—559.
- [23] Cutcliffe J R. Adapt or adopt: developing and transgressing the methodological boundaries of grounded theory[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005, 51(4): 421—428.
- [24] Glaser B , Holton J. Remodeling grounded theory[J].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2004 (2):607.
- [25] Kelle U. Emergence vs. Forcing of Empirical Data? A Crucial Problem of Grounded Theory Reconsidered[J].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007 (Supplement 19): 133—156.
- [26] Bryant A. Grounded theory and pragmatism: the curious case of anselm strauss[J].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2009 (3).Retrieved from <http://nbn-resolving.de/urn:nbn:de:0114-fqs090325>.
- [27] Simmons O E. Book review: essentials of accessible grounded theory (Stern &Porr, 2011)[J]. The Grounded Theory Review, 2011,10 (3): 67—80.
- [28] Gentles S J, Vilches S L. Calling for a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sampling terminolog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posed clarification derived from critical analysis of a methods overview by McCare and Pursel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017 (16): 1—7.

- [29] Coyne I T. Sampling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urposeful and theoretical sampling; merging or clear boundaries[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1997 (26): 623—630.
- [30] McCrae N, Purssel I E. Is it really theoretical? A review of sampling in grounded theory studies in nursing journals[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016 (72): 2284—2293.
- [31] Chein I. Appendix: An introduction to sampling[C]// Kidder L H(Ed.), Sellitz, Wrightsman & Cook.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Relations (4thed). TX: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1.
- [32] Cutcliffe J R.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grounded theory[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000 (31): 1476—1484.
- [33] Glaser B G.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advances in the methodology of grounded theory[M]. Mill Valley, CA: The Sociology Press, 1978.
- [34] Burnard P A. Method of analyzing interview transcript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J]. Nurse Education Today, 1991 (11): 461—466.
- [35] Glaser B G. Memoing: a vital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M].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2014.
- [36] Santos J, Cunha K, Adamy E K, et al. Data analysis: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of the grounded theory[J]. Rev Esc Enferm USP, 2018 (52): 1—8.
- [37] [美]肯尼思·J. 格根. 关系性存在:超越自我与共同体[M]. 杨莉萍,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
- [38] Glaser B G. Choosing grounded theory[J]. Grounded Theory Review, 2014,13(2): 3—19.
- [39] Crotty M.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research[M]. London: Sage, 1998.
- [40] Scott H. Growing grounded theory: doing my bit[J]. The Grounded Theory Review, 2017, 16(1): 43—45.
- [41] Ahmed S, Haag M. Entering the field: decisions of an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adopting classic grounded theory [J]. The Grounded Theory Review, 2016, 15(2):76—92.

Grounded Theory: Its Misuse and Clarification

CHEN Yin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Grounded theory (GT), as a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its own right, has been widely misused in its popularization and use in China. By doing a review of the GT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roots of the methodology amid distortions since its origination. It intends to help novice researchers employ the methodology more knowledgeably. Strauss, as one of the originators, was indeed absent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methodology. This explains his subsequent departure from the original methodology and many more “versions” of grounded theory as witnessed in the literature at the present moment in time. In actuality, these “versions” have significantly deviated from the original methodology on the pretext of “innov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deep description, the hypothetical deductive thinking, the use of “three-level coding”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Vivo as part of the methodology. Novice researchers are strongly urged to revisit the original text of GT methodology and adopt GT in their research as it is intended, and to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 of natural presentation and “let the data speak for themselves”, so as to generate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theory. Novice researchers should be clear about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conduct embodied learning, and pursue social practice if they want to integrate the method core into the research.

Key words: grounded theory; qualitative research; hypothetical-deductive; NVivo; embodied learning

[责任编辑 苏良亿]